

〔美〕斯坦菲尔德 著

美国中央情报

局长的自白

胡定王伯璘 译
李广琴 王薇

华 文 出 版 社

美国

中央情报局长的自白

〔美〕 斯坦斯菲尔德·特纳 著

胡 定 王伯璘 译
李广琴 王 薇

华 文 出 版 社

1991年·北京

责任编辑：王文祥

封面设计：冯光美

美国中央情报局长的自白

〔美〕斯坦斯菲尔德·特纳 著

胡定 王伯璘 译

李广琴 王薇

华文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135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朝阳区新源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375 字数184千字

1991年7月第1版 1991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7—5075—0154—X/Z·101 定价：3.30元

导 言

有人把1985年称为“间谍年”。的确，这一年在美国国内及国外揭露了为数惊人的情报案件。有13个美国人被揭发出来是为其他国家作间谍的。其中包括两个中央情报局的现任官员，一个被指控给中国作间谍，另一个被指控给以色列作间谍（不仅是给苏联作间谍）。此外，还有一个中央情报局的前任官员，他是第一个因间谍活动受到控告的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更为严重的是，在美国海军内部就有一个间谍网。在国外，则有三个苏联情报官员叛变投向西方国家，出现了一种情报人员反复无常的奇怪状况。还有不少的西德人因为害怕他们给东德作间谍的事已被发觉，于是叛逃或企图叛逃到东德。法国情报人员也曾打算以“隐蔽行动”阻止和平运动分子对法国在南太平洋进行核试验的阻挠，但因手法拙劣而遭致失败。

这些惊心动魄的间谍案件引起了国家和社会的重视。我们的情报活动在战后三十年中不能借口全部保密而停滞不前，我写这本书的关键所在，是想告诉美国人我们的情报工作可以放心地向人民公开。我们这样大的情报机构，如果没有社会的理解，就会像1975—1976年美国情报工作所面临的情况一样，要受到不重视社会批评的指责。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情报工作毕竟是一项冒险的事业，如果公之于众，自然难免出现错误甚至带来失败。

过去出现错误最多的领域是在反情报工作方面，也就是

1985年揭露出来大量间谍案件。因此，在本书中论述的如何进行反情报工作，是有着重大现实意义的。我们的工作还不够完善，对于1985年所破获的叛变分子未能防患于未然，我们的心情沉重是可想而知的。回顾战后第一个三十年的1975—1976年间，美国情报机构曾以反情报工作为借口，而过多地侵犯了人民的私生活，我们的心情也为之不安。

我希望读者在看到反情报工作的章节时，会有助于理解反情报工作的分寸是如何难以掌握。因此，我们在防范间谍方面，不如他们的条件有利。

不过，1985年的间谍案件的另一个教训，那就是说苏联也并非无懈可击的。即使仅有两个——更不用三个了——比较高级的中央情报局官员于1985年叛逃到东方，任何美国情报机构的首脑都会大为震惊。所以，据我看来，这些出自苏联情报机构的叛变事件，证实了我在本书最后一章中得出的结论，即美国的情报机构要比苏联的好得多。因为他们常常假借反情报工作的名义而任意侵犯公民的私生活，使得许多苏联人民对他们不满和疏远。简而言之，正是他们在侦察间谍中所具有的这种有利条件，反而变成促使他们本国人民叛逃的理由之一。

西德人和法国人在1985年遇到的问题，是本书着重论述的另一个要点，即在民主国家中需要从外部来监督情报活动。德、法两国的经验表明，他们的当局对进行中的情报活动失去监督，加之职业情报人员积习很深，缺乏政治锻炼，结果出现了使人们颇感尴尬的情况。但是，提供必要的政治监督并不是象人们所想像的那么容易，本书的一个主题就是探讨如何才能达到这个目的。

显然，因为我们在保守必要的机密的同时，在情报活动

接受政治监督方面也取得了明显进展。所以，我们今天的情报制度和其他任何国家是不一样的。本书试图论述我们是如何巧妙解决那些存在已久的问题，而做到这一步的。这部书并不是我作为中央情报局长的回忆录或编年史。更不是为我可能犯过的错误进行辩解。同时，也不想利用对间谍和阴谋活动的叙述来激起人们的好奇心。那些可以留给小说家来写。我只希望本书能够正确地讨论在开放和民主的社会中，执行保密情报活动所无法避免的问题，并指出要使这种社会和这种活动协调起来是多么的复杂。我希望通过本书告诉那些想要了解这种复杂性，并且承认即使有简单的解决办法也无济于事的人。让他们知道那些批评我们的情报工作对社会造成威胁的人，以及那些为了国家安全而容忍任何侵犯个人隐私的人，这两类人过犹不及都是错误的。在各种见解中，最关键的，是需要良好的情报才能，但是这种需要不能作为滥用情报保密手段的辩解。

为了理解这种不可避免的紧张状况，必须回顾近几年来美国情报工作所发生的重大变革，特别是以下两项实质性的改革。

第一，是国会和白宫强行从外部来监督一切保密情报活动。在全世界的民主国家中，只有美国才能对约束政府的最机密的部门，做得这样彻底，尽管这是出自人民的愿望。

第二，是收集情报的技术日益发展。美国创造性使用了人造卫星、计算机和其他技术革新的产品来收集情报资料，取得了很大效果。只有美国具备这样的科学基础和经济力量，能够把收集情报的技术，发展到如此先进的程度。

美国的情报工作跨过了几个重要阶段。在70年代的中期和后期，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央情报局建立以后的三

十年，第一代职业情报人员——他们之中许多人是战略情报局的老手——到了退休年龄，领导任务要让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长起来的那一代有经验，有世界眼光而且能够胜任的人们。

在这同样的三十年中，公众对情报工作的看法也有了改变。在50年代和60年代的冷战时期，人们信赖政府的一切施政。到了70年代，他们突然认识到政府的作为，并不完全都是符合自己的心愿的。人们要求参与决策的制订。对于情报机构来说，转变态度意味着要重新评价他们的工作方法。

结论是，随着美国在发展着的海外的利益，已从几个共产主义国家的军事力量扩展到世界上150个以上国家的政治、经济及军事方面，因此情报工作也需要相应地增长。

1977年初期，由于上述重大发展，美国的情报工作需要改弦更张，我出乎意料地卷入其中，被突然任命为中央情报局长。尽管我在海军时和情报机构有过密切关系，但实际上我对于情报专业是个门外汉。因此，我和职业情报官员对待改革的看法不同，对他们的作法也有不同的反应。一方面，我不十分熟悉这个系统的技巧——这确实是不利条件。因为我不能在一开始时就充分理解改革对他们的工作将带来多大的影响。另一方面，我对改革没有偏见与阻力，当反对改革的争论主要是基于传统，而非出自理性时，这又是个有利条件。

本书叙述的是我从1977年至1981年，指导美国情报工作的经验。在此期间我进行改革，更重要的是试图建立长期的、更有效的情报业务。我认为美国模式的情报工作改进了曾经采用过的欧洲传统的模式，因而适合美国民主制度的需要，从而保证了情报工作能做得更好一些。

第一项改革（群众监督），是构成新模式的主要因素。民主国家内的保密机构如果不能与时代合拍，人民不了解政府的所作所为，群众监督就是一句空话。1975—1976年的三个主要调查委员会深入调查过以往为情报工作中存在的弊病所作的辩解。他们发现情报机构利用特权，不适当地侵犯了美国人民的私人生活。虽然材料不尽真实，却引起了社会对情报工作须加以监督的要求。因而，国会与总统就成为监督情报机构的人民代表。

1976年2月，福特总统发布了关于情报工作的第一个最高行政命令。当年夏天参议院建立了对情报局的小型特别委员会。一年以后，众议院也成立了同样的委员会。这些行动满足了关于监督的要求。但是职业情报人员怀疑这样一来是否会破坏情报工作的原则——保密呢？毫无疑问，情报工作的大门要比过去开得多一些，问题在于这个门应该开得多大？关于不违法的事国会能管多少？情报工作中不宜暴露的高度机密及必要的行动计划，国会需要知道多少？如果一个有良心的职业情报人员，为了不危及国外帮助我们的间谍的生命时，能泄露多少情况？国会为了保证情报机构完成收集和保护情报的任务，很难权衡出恰当的监督方法。

第二项改革是随着技术能力的巨大发展而出现的，对情报的收集大力加以改进。在这种情况下，使得情报机构的内部和外部都产生了误解。许多年老的职业情报人员认为改进新技术是传统间谍技术的末日来临。他们不考虑新技术具有保密、准确和减少暴露风险的优点，就表示反对。我们既能从卫星摄影得到信息，就不必派人冒着生命危险去收集情报了。只有在科学不能代替人力的情况下，我们才使用人力。如何把人力同新技术结合起来，是一个实际问题。

我们发展技术能力时，也重视在从事各种系列的技术工作的6个不同情报机构中，进行紧密合作的必要性。因为一种技术体系所获得的资料，往往是下一种技术体系需要测知和继续进行下去的线索。但是，承认合作的必要性比较容易，要做到这一点却相当困难。每个机构都是半自主性质的，而且对于在哪些地方集中收集情报的力量，都有它们各自的想法。于是，改进技术能力，引起了那些寻求在情报工作上进一步增强中央权限的人，和那些不愿放弃他们的自主性或者害怕强有力的中央控制会影响任何保密机构的人之间的持续斗争。

1977年，美国情报工作面临两项改革，因而动荡不安。主要是担心失去社会的支持。因为一个国家机构没有社会支持是不能存在的。最重要的在于恢复失去的信心。到处批评不仅影响士气，也使得情报人员不愿去冒生命危险和承担重大任务，以免遭到失败而受更多的批评。一切重要信息的收集都要冒风险。监督情报人员多负责任，同时也要鼓励他们不怕风险，这项工作对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挑战。

美国模式的情报工作的改进是无止境的。情报工作是一项有生气的职业，本书并不是对此种模式加以誉扬或描述，而是论述它如何改进的，在什么地方改进的，以及对未来的展望。从1977年—1981年我指导过美国的情报工作，我想说明实现改进的理由。一位哲学家讲过“忘记过去，就注定要重陷覆辙”。我希望美国情报工作新模式的演变历史，将有助于那些想在日后进行改革的人们作参考。也希望有助于社会理解情报事业所遭受的压力，因为这项事业需要美国社会给以支持和监督。

在本书的结论中，我提出了一些建议，以便在保密、监

督和技术发展的矛盾中，改进我们的情报工作。我确实认识到我缺乏远见，也不善于接受别人的高见。但是我不能因此而推卸责任。我愿意承担我在中央情报局长任职期间的一切责任。

目 录

导言	(1)
第一章 挑战	(1)
第一节 华盛顿来的电话	(1)
第二节 华盛顿的美差	(13)
第三节 帷幕升起	(23)
第二章 开始工作	(28)
第一节 萦绕心头的往事	(28)
第二节 谍报：隐晦的科学	(36)
第三节 反间谍活动：我们当中有坐探吗	(49)
第四节 幕后活动：搞阴谋诡计的部门	(63)
第五节 暗中的革命：机器间谍	(76)
第六节 国内的间谍活动：新闻媒介及其它	(85)
第七节 分析意味着什么	(99)
第八节 推销成果	(113)
第三章 适应监督	(123)
第一节 鱼缸里的谍报活动	(123)
第二节 抓获间谍和在地道里碰上俄国人	(135)
第三节 幕后活动的争论	(146)
第四章 如何控制这个庞然大物	(159)
第一节 三个中央情报局，不是一个	(159)
第二节 万圣节前夕的“大屠杀”	(171)

第三节	人与机器	(182)
第四节	为什么中央情报局是独一无二的	(189)
第五章	控制各方势力范围	(198)
第一节	白薯地里的间谍飞机	(198)
第二节	混乱的情报报告	(204)
第三节	情报分析中的畸形竞争	(212)
第四节	难驾驭的队伍	(228)
第五节	行动议程	(244)

第一章 挑 战

第一节 华盛顿来的电话

电话是1977年2月2日打到意大利那不勒斯的。十八个月来，我一直是北约组织的南翼武装部队司令。担任此职可以享受优厚的待遇，包括一所大理石造的巨大别墅，可以纵览东起维苏威火山，穿过那不勒斯海湾，南到卡普里岛的景色；还有一艘摩托游艇，一架双引擎专用飞机，一座建于莫索里尼时期的地下办公室和经常进行的、有时很有趣的社交生活，以及周游欧洲的机会。我拥有名义上的战时统帅的权力，除了统辖部署在地中海的美英两国海军外，还能指挥希腊、土耳其和意大利的所有陆军、海军和航空部队。这是个令人羡慕的美差。而我却怀着职业性的反感。

由于种种想法和目的，我被调离了美国海军，甚至是调离了美国军队。尽管我受欧洲盟军最高统帅，一位美国将军，亚利山大·黑格的节制，但是只为北约组织工作。北约组织几乎完全是政治性的。战备工作分别由各国武装部队的司令官们负责。现在是和平时期，事实上，在我麾下并无一兵一卒。

1975年，美国海军派我前往那不勒斯，于是我离开了华盛顿，并脱离了海军的主力部队。由于我的非正统观念，使那些较为保守的同事们感到威胁，把我看作危险人物，我一

直是埃尔莫·朱姆沃尔特海军上将的有力支持者。1970年，他出人意料地就任海军参谋长，成为该职务历任中最年轻的一位，又是自切斯特·尼米兹海军上将以后最明智而且精力充沛、能够放手进行必要改革的海军参谋长。他着手对海军内部作了某些重大的变更，从而与海军中坚持陈旧路线的人形成对立。他的观点之一是解脱海军过去依赖大型航空母舰观念的束缚。任何有经验的海军将领、包括朱姆沃尔特和我，都很重视航空母舰过去以及今后将要发挥的作用。然而，对于超级航空母舰时代是否逐渐成为过去，以及我们是否要扩大海军的实力存在着分歧。朱姆沃尔特还设法使海军对男女青年更富于吸引力，将它的未来寄托在他们的身上。为了能有足够的高质量的水兵应征和再次应征来保持一支强大的海军，朱姆沃尔特作了一些改革，使海军适应外界发生的变化，以缩小平民与军队生活之间一直存在和日益增加的差别。人们广泛议论的是，他允许水兵蓄须，留稍长的头发及穿时髦的制服等。其中许多想法来自他与分布在全国沿海基地及舰艇上的下级军官和军士的无拘束的讨论。我称赞并且支持他把人们关心的问题提到海军议事日程的做法。

朱姆沃尔特使我迅速得到晋升。他任海军参谋长时，我是海军少将。对于一名新的海军将领来说，尽早得到一个海上职务是十分重要的。朱姆沃尔特为我安排了一个很好的工作，即指挥地中海一支航空母舰特遣舰队。在我就任不久之后，他便将我召回五角大楼，主管海军系统分析处；这是一个几年前由他建立的机构。他用故意说反话的口吻，称我是他的“常驻狗崽子”。尽管如此，我只在那里干了一年。一年后，他把我提升为中将，并任命为设于罗德岛纽波特的海军军事学院院长。他授予我全权，到那里去研究我认为对高

级军官学员必要的一套严格教程。我将原来被动的教学计划，即由学生用大部分时间听课，改为要求学生主动地认真读书、写作及分析评论各种见解。这样做，起初使许多学生感到苦恼，因为他们留恋过去的缓慢节奏的学习生活，但自此以后的数年中，我从未听说过纽波特军事学院有多少毕业生不认为在学识上有收获；而这正是我所要达到的目的。1974年，当朱姆沃尔特的四年任期将满时，我得到了对一位海军中将来说，最为满意的海上职务之一，即大西洋第二舰队司令。然而，几乎在朱姆沃尔特刚一离任，海军就开始复旧，朱姆沃尔特的人都靠边站了。到1975年，尽管我被授予四星级海军上将，仍被“外放”到了那不勒斯。

及至1976年夏，我开始考虑退出军职。我认为，我看到了凶兆，不再可能重返军队的关键部门。我觉得，如果我打算去商界尝试一下，就应该尽早着手。我已52岁了，从1943年进入海军军官学校以来，一直在海军供职。然而，恰逢此时，一位安那波利斯军校的同学，吉米·卡特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从我对他不多的了解来看，他是个热心肠而且有兴趣重新探讨国防问题的人。一旦他当选为总统，军内将再次更加带批判性和创造性地考虑问题，这就有可能给革新派提供更多的机会来影响国防决策。我决意再等一等，看他能否当选。

此刻，1977年2月2日，卡特已当选总统入主白宫。下午四时半，我的副官沃尔特（布奇）·威廉斯海军少校闯进我的办公室。

“将军，从华盛顿打来‘保密’电话找你。”

电话是国防部长用带反窃听器的特别话机打来的。由于我是为北约组织而不是为美国国防部工作，我认为他未必是

把我当作南翼部队司令给我打电话的。在等待正式接通讲话时，我想到新任国防部长。因为我希望吉米·卡特将认真考虑国防问题，我有保留地欢迎哈罗德·布朗出任国防部长新职。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中，他身兼国防部助理部长和空军部长，并且多年来，他一直是制定国防政策的人物之一。尽管如此，我的保留意见并不强烈，因为我并不了解此人。

“特纳将军，”国防部长说，“总统希望明天在白宫接见你，你能到这里来吗？”

我说可以。然后，我试图探听接见的有关内容，便问是否要做什么准备。结果，并未得到任何暗示。

整个通话只进行了二、三分钟。布奇忙着安排行程，而我则与妻子帕特里夏通了话，要她为我准备行装。接着，我们推测这次会见可能意味着什么。也许是要讨论军事形势，就象两年前在亚特兰大与原州长卡特谈的那次一样。也许是一次新的任命。我们很快为某些可能的任命编出密语。这样，便可以从华盛顿用别人不懂的话将秘密消息告诉她。我最后说，“为我祈祷吧。”便挂上了电话，继续准备会见总统的事宜。

我打算在动身前能够听到某些建议。于是接通办公桌上的内部通话器，让我的行政助理、海军中校伯纳德·麦克马洪去请另外三位高级助手，要他们放下手中的工作到我的办公室开会。我选择伯尼·麦克马洪担任这个职务，因为他是一位思维敏捷的优秀领导者。他只不过在华盛顿一度供职，但这便足以使他深谙其中门径了。他召来的另外3个人，一位是美国陆军中将罗伯特·麦卡里斯特，他是南线武装部队司令部的第二号人物。麦卡里斯特和我毕业的时间只差一年。他毕业于西点，而我来自安那波利斯。在过去一年半

中，我们一起工作得很愉快，而且我很尊重他的意见。他是个有节制而稳重的人，恰当地弥补了我的快节奏风格，也是司令部中唯一能够察觉军队上层想法的人。他从我们的办公室之间的过道走进来。

小乔治·蒂博尔特海军中校正在司令部隔壁的球场上赛手球。他紧接着麦卡里斯特来到了。乔治曾在海军学院和第二舰队做过我的特别助理，又同我一道来那不勒斯。我信赖他，把他当作智囊，他是一位反应敏锐富有才干的演说家和军事战略文章的撰稿人。

第3个人是另一位海军中校罗伯特·哈泽德。博比·哈泽德和乔治·蒂博特并肩从事特殊项目的工作。博比曾在朱姆沃尔特手下服务，对五角大楼的政策怀有好感，并且了解华盛顿局势的特点，进来时也象他们那样兴致勃勃。

麦卡里斯特的反应是：“好！终于有消息了！”他预见到，我作为总统的同学可能分配到更为重要的岗位，也许总统打算任命我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但我认为这只不过是幻想，总统可能要从他的四星级将军那里听取想法，并征求意见。这样做是他在挑选他们其中之一担任某项高级职务以前的一项完全正常的程序。无论怎样，我感到需要准备应付一系列的提问。于是，我要他们4位扮演总统，而由我来试行解答“总统”提出的问题。

“国防部存在什么问题？你对改进有什么想法？”

“如果你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或者是海军参谋长，你要着手做的头三件事是什么？”

“我们应该购置B—1型轰炸机吗？应该购置更多的核动力航空母舰吗？”

“你对军事实力的现状满意吗？”